

祝附中青春不老，进步不息

——1961 年 11 月 2 日在附中 60 周年
校庆大会上讲话

林砺儒

师大附中 60 年的发展史与我国中学教育发展史有很大关系。我要把当年建校的经过简要地叙述一下。

1901 年 11 月 2 日，北京五城学堂——师大附中前身——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公立中学的诞生。

大家都知道这一年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帝国主义集团强加给中国的一条最刻毒的枷锁，从而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决心。

同年又一件大事是废除了八股文。毒害了中国知识分子历时五百五十余年的八股文至此



林砺儒（1889～1977）

才废止。这也说明了清政府慑于当时舆论，勉强废了八股文，并宣称准备废科举，兴办学堂。北京五城学堂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的。

北京五城学堂是普通教育性质，也是头一个独立设置的普通学校。然而，为什么不叫做“五城中学”呢？就因为那时候还未有“中学”这个名词。“大学”和“小学”都是我国固有的名词。惟有“中学”这个名词直到1902年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公布之后才出现。

1902年以前直追溯到1862年，北京同文馆成立，这40年间，中国也曾仿照西方办学，设立一些学校，讲习“西学”，俗称为洋学堂。这时期没有学制系统，更没有普通教育制度，所有兴办的学堂，都是为培养“洋务”人才——翻译、海、陆军，工业，交通等等——服务的专业学校。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发觉了学生们没有普通知识作基础，难接受专业教育，乃在校内增设一种补习普通知识的预备班，当时起名为二等学堂，直译英文的 Secondary school。翌年，1898年，天津中西学堂（后来的北洋大学）也照样附设二等学堂。1901年，北京五城学堂是头一所独立设置的二等学堂，所以说，北京五城学堂是最早的公立中学，翌年随着壬寅学制的公布，就成为五城中学了。

当年五城学堂的设立，与北京电话局的开办有莫大的关系。双方的总办是一个人，福建人陈璧。电话局与五城学堂都设在厂甸，局的大门与校的大门（附中南门）都紧挨着在一起，学堂的电话是0007号，而一至六号都是局内自用的，所以七号电话是当时民用电话的头一号。我们今天从这些事实还可以看出当年五城学堂与电话局像是一家，学堂的设立是打算为北京电话局服务的，这反映着1902年以前的兴学作风。假

如没有 1902 年壬寅学制的公布，五城学堂就很可能在二等学堂的基础之上设立头等学堂，而成为一所电信专业学校。它的兴办目的与上海南洋公学、天津中西学堂一样，都是为洋务人才服务。所不同的只是那两校是由专业班办到普通班，而五城学堂接受了上海、天津的经验教训，要先由普通班着手罢了。1902 年壬寅学制的公布，是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发展史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才有学制系统，才有普通教育制度。而师大附中的前身五城学堂正是前后两阶段的转折点，它挑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按 1902 年壬寅学制的规定，京师大学堂，内分一科（大学预科）三馆——译学馆、进士馆、师范馆。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成立于 1902 年冬季。翌年，癸卯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公布，规定高等师范教育定名为优级师范学堂，由首都及各省省会设立，再经过几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才独立成为北京优级师范学堂，迁至琉璃厂厂甸，和五城中学在一处，而五城中学从此成为附属中学。自此以后，附中就更有条件负起中学教育开路先锋的重任了。

林砺儒：著名教育家。1922 ~ 1927 年；1928 ~ 1930 年任附中主任。1949 年历任教育部中教司司长、教育部副部长、北京师大校长等职。一生辛勤从事教育工作，锐意改革，我国中小学各六年的学制，林先生是最早的倡导者、实行者之一，还组织各科教师自编教材，对全国教育有一定影响。

纪念数学教育家傅种孙先生

金保赤

我和傅种孙先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同学，多年同在师大附中任教，后来又都回母校教课。我们抗战期间分别在西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执教。1950年全国解放，我回到北京，他提醒我应该回原岗位，我便回校任课。他当时任教务长，我又在他直接领导下兼做部分教务事宜，朝夕相共，更增加了我对他的认识和钦佩。

首先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两三年间的治事精神。他禀性耿直，做事公而忘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北京解放后不久，在偶然的会下，因湘潭汤璟真教授的介绍，种孙先生得以会见毛泽东主席。会谈之下，领袖对种孙先生的学识，颇为器重，勤勉有加；种孙先生则受宠若惊。试想解放以前，被反动政府视同草芥、长期遭受迫害的一位科学家，一旦亲聆主席教诲，受到和煦拂拭时，所思何事？只能是谋求如何适应时代需要，力图报称而已！种孙先生出任师大教务长之时，正届北京和平解放之初，师大一如北京当时其他高等学校，疮痍遍体，百废待兴，全校师生无不喁喁望治；但思想徬徨则无可讳言。当时安排副教务长丁浩川同志主持政治思想工作，而举凡教学秩序、课程调整、教师编制则统由傅教务长负责。其间与苏联专家的配合，如何抉择，如何扬弃，尤其

煞费周章；使一位认真负责的科学家心力交瘁。先生患胃溃疡多年，此时往往因公务繁忙，日不暇给，以至废寝忘餐，常以几片饼干充当膳食；教务已极度紧张，而新校舍的建设，从图纸设计到工地实践，也在他的治事范围之内。记得一次讨论计划，傅先生在主持数十人的会议之中，因胃溃疡复发而大口吐血，但仍坚持把会议进行到底。其所以殚心竭力、呕心沥血以赴事功，无非是爱党、爱人民、爱教育事业的集中表现。

傅种孙先生的治学精神，可以概括为“谨严”二字。他的教学工作同他的治事精神一样，也是认真负责，数十年如一日。他对课堂教学，极有研究，讲课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鞭辟入里，尤其边讲边写的板书，总是成竹在胸，写来眉目清楚，远看如画图。有人以为这是小节，其实大有助于理解，能使学生印象深刻。曾有旁听过的人，认为他的板书足为楷模，遂于下次听课时携来相机，将所作板书一一摄取，然后作为插图编入他自己所著的数学教学法书里，深受读者赞许。于此可见种孙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其研究教学法的精到。我记得在 20 年代师大附中为一位敲钟 40 年一无差错的工友开了一个表扬大会。会后傅先生对我说：“长期不懈地努力是一切成功的秘诀。”这话也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中的一种信念。他在数学上的造诣，我虽不敢妄参末议，但知他与当时数学名家时有来往。他数十年培养的门弟中，后来在著名大学数学系充当主任和教授的，很不乏人。他的著作很多是结合他数十年课堂教学经验而写的，与纯理论文章不同，因而弥堪珍贵。他在师大附中以其长期经验和其他数学教师共同创办算学丛刊社，完全以数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为目的，编纂中学适用的整套数学教科书；既在师大附中使用，为该校同学奠定了理科的坚实基础，后来又通行全国，把当时疏漏多端的中学数学教

材整理得理论严密、条理清楚。这番功绩不可磨灭。

种孙先生把培养人才引为自己不容忽视的责任，而且怜才爱士。凡在社会上但有一技之长，便嘉奖与提携，多方延揽。

以上仅就个人记忆所及对傅先生治事、治学与执教三方面略述梗概，藉以纪念。我今年八十有二，且重病在身，写此短文，聊申积愆。

金保赤（字少曦）：1918年校友。对外贸易学院教授。

回忆母校——高师附中

马 巽

我 1914 年进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高等小学（当时学制：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四年，然后考升大学或专门学校）的一年级，1915 年二年级时，移到新落成的校舍，就是现在南新华街北头路东，沿街可以看到的红色木造二层楼房。当时和平门豁口未开，还没有南新华街，包括高师、附中、附小三部分在整个带有小丘陵的校园里。后来开了豁口和南新华街，把高师和附中、附小隔开了，这个小木楼就沿街了。这座建筑虽经 66 年，看来还是很健康牢固。现在每当路过那里，总不忘要隔墙仰望一下，心中在问候它“可好”。我 1916 年高小二年完毕转入附中的补习班。翌年升入一年级。到 1919 年三年级时离校。

回想附小、附中前后五年，少年期间的经历，犹如昨日，使我感慨无限。仅叙数端，以志怀念。

回忆师长

韩主任：当时附中主任韩振华（字诵裳）先生，是我们尊敬的老师。韩先生原留学日本学工，与我父亲同学有深交。回国后，因他是天津教育世家，要他来改组五城中学，改隶高

师，成立附属中学。韩先生办学极严谨、强调德智体并重，要建立良好的校风，大胆革新课程，提倡体育运动。当时请到很多知名的老师，如：国文有钱玄同先生，他是五四运动中提倡新文化，改革汉语的急先锋，文字学大师，又是高师北京大学的教授。英语有赵乃传、陈国梁；中国史有黄人望；数学有张辅庭、程春台；物理化学有吴学周；音乐有谱当时国歌的音乐家冯亚雄（为母校组织管弦乐队，在当时中学校是罕有。他派我吹小笛）；还有一位张鸿来（字少元）先生，是韩先生的得力助手，他对母校的成长，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这些位老师直接影响着母校的朴实认真的校风和严格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以下再举几位对我印象深刻的老师。

张辅庭先生：张老师是留英的北洋水师，中日战争失败后就教英语和数学。教我们代数，用英文教本，要求极严，每堂留作业不下四五十题，每周两堂就达一百来题。对十四五岁贪玩的孩子来说，确是个重大的负荷。可是同学们都甘心情愿，深感兴趣地努力去完成。而张老师对全班四十多人每周两次的作业，一一校阅批改，按时发还。对重大错误就不免加上严肃批语，斥责我们作为他老先生的学生不应出现这样错误。张老师是高大身材的胖子，可是在我们的作业本上写得一手像女孩子写的纤细秀丽而工整的小字。作业受到批改，我们还是很高兴地欣赏模仿那优美的字体。张老师不管在堂上堂下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我们虽不免有点畏惧，但内心坚信他是 100%要我们好，对我们有莫以名状的吸引力，没有不对他怀着亲爱敬佩的情感的。对学业我荒疏了五六十年后的今天，还能给考大学的孩子们补习代数、几何，因而自然而然就怀念当年张老师赐给我的恩物。

张鸿来先生：张老师在附中任教大概有四十余年。担任国

文外，还襄助韩主任办校务。老少同学可能都知道他。他刻苦读书，钻研文字学，谦虚好学。韩主任请钱玄同先生来教国文，他敬佩钱先生的学问，要求拜门求教，钱先生谦辞至再，结果还是举行了拜师仪式，从此对钱先生谦称“弟子”。他比钱先生年长十来岁。主要向钱求教文字学。后来听我父亲说：张老师说，正了名分，就可大胆求教，无所顾虑了。张老师住琉璃厂西门，非常俭朴，可是舍得钱买书。和琉璃厂的旧书铺都很熟识。经几十年搜集了很多罕见的有关“小学”（文字学）的书，他收藏的小学书籍之多，是国内可数的。张老师自己说：“这是玄同先生指点的成果。”张老师教过我我国文，有一次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们俩已是同门师兄弟了。”（张老师知道我四岁时钱先生开始教我《文字蒙求》认篆字，是我的启蒙老师，故有此语。）1956年我来北京，特地去拜望张老师，他已82岁，高兴地拉了我走到南柳巷去见韩主任。那次是我和两位老师的最后会晤。

吴学周先生：吴老师是我们物理、化学老师。记得讲到光学和银元素时，吴老师亲自设计建造一个极简单的暗室做实验。教我们每人用马粪纸糊成一个“针孔照相器”，他去买了干板（65年前的北京还没有胶片，虽已有携带式照相机，亦还是很笨重的），裁成小块发给我们，安进针孔照相器，让我们去照了像，轮流进暗室显影，又在日光下用POP纸晒像定影等一系列的实验，不仅在教学上得到很多感性知识，此外同老师好像形成了“父兄+老师”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的教学效果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黄人望先生：黄老师是高师的中国史教授，韩主任请来教我们中国历史。黄老师来到讲堂，从来不翻教科书，讲课口才极好，上来滔滔不绝地讲，不管是左传、国策、楚辞，还是史

记、汉书、通鉴，随口成段背诵，然后讲解。他真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能吸住全班的注意，不觉一堂 50 分钟一晃过去。黄老师讲过的东西，像一篇一篇故事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令人难忘。

钟道畅先生：钟先生是我们手工老师。在每周两小时的时间里，教我们纸工、竹木工，着重工具的使用。韩主任特辟一间手工教室，备有竹、木、金工所用简单工具和木床，给了我们亲手使用的机会。不知韩主任从哪里请来这样一位难得的手工专业的老师。

陈国梁先生：陈老师是教英语的，水平很高，能说能写，发音又好，后来是燕京大学的教授。陈老师喜欢各种体育运动，他就义务指导母校体育运动。母校的足球、篮球、网球、田径赛等能在北京占一席之地，陈老师大有功劳。此外他还领导同学参加英语的演说和英语歌咏活动，对提高英语水平有极大帮助。

同学们近况

郑庆甦（现改名天挺）：是附中改组后第一班学生，我与他弟郑庆珏（已故）同年，因而相熟。六十多年，未断来往。现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是当代明清史大师。

张峻（现改名乔嵩）比我高四班，是工程专家。

辛裕贞：比我高四班，是工程专家。在北京工专任教。足球校队后卫。

马泽民：比我高四班，短跑健将，足球校队右翼。近况不明。

陈树樾：比我高三班，跳掷运动健将，足球校队中坚（中

卫)近况不明。

赵世炎：比我高两班，“五四”运动时带着我校队伍去赵家楼，回校后，在操场对全校同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已故。

高一班有李懋、杨同保、李光彦，(模范教师)均健在。

同班有何延熙(现改名甦)、鲍士贤、翁惕、吴璋、姚鼎新、杨观保、添士昌(现改名意若)等均健在。

仅就回忆所及，拉杂如上。

马巽：1919年毕业生。中国科技情报所研究员。

母校的优良传统

陈遵妣

我是公元 1917 年从北京畿辅中学读完一年级后转到母校二年级攻读的。由于母校是当时全国模范中学，做父母的总想自己的子女能考进这全国闻名的中学。

当时母校是四年制中学，所以我在 1920 年暑假毕业。同年共毕业两个班约一百人，我们得甲等的共四人，每人由学校奖一本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我把它留在南京。张钰哲的一本曾被带到后方，足见他对这本纪念品的爱惜与重视，我远不如他。

当时校长是韩振华，他是日本东京工业学校毕业的。教务长姓张，绰号是“煤铺老板”。数学程老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教书，1962 年春节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师生同桌共餐，真是难得。英语老师赵述庭，1953 年我在上海华东师大兼课时，还见到他。化学吴老师是一个高个子。博物老师李泰芬。这些老师都是给我印象较深的中学老师。

每天上午 10 时做工间操，韩校长总是参加的。下午课后集体到操场运动，我爱踢足球。母校使我喜爱运动，爱做工间操。今虽年已八旬，仍甚健康，不能不归功于母校！

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数学，程老师非常地好！个个习题都

要做，几何用温德华氏几何学（英文本），习题也用英文解答。这两个习惯使我在日本东京高师数学系读书时，所有习题，老师虽然没有让学生做，但我仍然每习题都做，而且都用英文解答，博得日本老师的赞赏，经常在日本学生中表扬我。遇有难题，学生去问老师，老师多告诉他们，你们先去问“陈样”，不会时再来问我！这样的荣誉应归功于程老师。

博物李老师，老在黑板上写一大篇笔记，要学生抄下来，他的一手好字，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这就养成我读书爱写札记的习惯。即看一本书，总要把它重要部分摘录下来，以备后来参考之用。1955年党命我写一本“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出版后，苏联科学院因为此书内容丰富，省得他们去找很多参考书，把它译成俄文出版，这种荣誉归功李老师培养！

英语赵老师，总是手拿着课本边走边念，要同学们跟着他念。记得有一课讲到有关人生观的问题，他说：“人生观就是三个“W”的问题，即：Why、Whom、How三个字。也就是“人为什么活”人为谁活”人应该怎样活”。我经常以这三个“W”问题问自己。到解放后，毛泽东著作给了我以明确的解答。赵老师对学生非常认真严格，记得有一次，坐在我桌旁是一位华侨姓严的同学，他有一题解答不出来，我就写一张条子给他，被赵老师看见了，记我一过！这是我无纪律、自由主义的表现！1953年我们在华东师大教员休息室碰到时，还提起这件事，大家都哈哈大笑！

母校的优良传统，不但有一套教学制度，更主要的是有经验丰富、教学认真的老师！

中学教育是人们打下基础知识的教育，非常重要，我热爱我的母校，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她！1933年我被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停聘时候，由南京返回北京，先在母校教数学

课，不久由于接受河北省农学院聘书才辞掉。

明年是母校诞生 80 大寿，届时我如未见马克思，我一定参加庆祝大会！

陈遵妫：1920 年毕业生。著名天文学家。

辛酉年回忆辛酉一班

汪振儒 贝璋衡

我们是 1921 年（那年是农历的辛酉年）入学的，因此在 1925 年编印毕业纪念册时自称“辛酉一班”（还有个二班，是首创男女同校纪元的女生班）。今逢母校庆祝建校 80 周年，恰巧也是农历的辛酉年，因此是我班建班的花甲周年，谨就回忆所及，写些不太系统的资料，以志不忘。

报名投考我班的据说有 400 人（男生），而录取的仅有 40 人，毕业时则只有 29 人了，如今在世的怕已不足 20 人，60 年来没有做过调查，所以情况不太了解。

辛酉一班是师大附中四年旧制的最后一班，此后即改为三三制的新制，也是男附中开放“女禁”最早的一班，同级的二班，是附中男女同校的第一班女生，在当时应算是“开风气之先”的。

据回忆我班在校四年似乎曾有“模范班”的称誉。班上的同学团结比较好，大家都热心维护班的名誉，如教室的清洁卫生及美化，课外活动，都有较好的成绩，曾组织过“燭火”社，当时的负责人如蹇先艾及李健吾已是现在我国知名的文学家了。同时大家在学习成绩上也比较好。

我班之所以能有一点优点，这是与当时老师的辛勤教导分不开的。一年级入学时的级任方蔚东老师兼授英文，极为严肃

认真而又和蔼可亲。二年级时任级任兼授国文的夏宇众老师也是热心培育后进的良师益友。三年级时的级任兼英语教师赵海天老师，四年级时的级任兼国文教师张建侯老师都是能给后进以莫大教益的辛勤园丁。此外还有很多老师都是令人怀念的，如王仲超老师，是教务主任兼给我班讲授数学、化学等课，李约（士博）老师讲授动物、植物及矿物学，周传儒老师讲授西洋史等，不能一一列举。

说到讲课，我班好像也是首先采用英文课本的一班，当时因受教会学校的影响，所以有些课都采用了英文课本，如数学、物理、化学、外国地理等都是。在今天看来，这恐怕是不足取法的，其效果如何值得分析，但对我们后来阅读英文业务书籍也还有一点帮助，可说是功过各半吧。

很可能我们是最早讲授语体文的一班，另外在二、三年级时还有两个缅甸留学生在我班学习，但未等到毕业他们就离开了。还有张挹兰烈士的弟弟张宗群也在我班学习过，也是未到毕业就离开了。

那时学校重视社会工作，设立了平民夜校，每日在下课之后由学生为附近未能入学的儿童补习，我班的杨宝麟同学等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辛酉一班对于体育活动也是很积极的，当时排球运动在北京的中学界还不太普遍，不过我班在 1924 年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市中学排球比赛，并且获得了第一名，当时的教练是体育老师徐涛。

1925 年在我班准备毕业之前，发生了“五卅”运动，我班也踊跃参加游行示威，以及上街宣传抵制日货，有很多同学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我们入校时，高士其同志（当时名仕琪）已在四年级，他

那时是童子军的队长，经常穿着童子军的制服出入学校，所以很引起我们注意。另外现在清华的张维同志，那时好像是在初一或初二，他班的教室和我们的相邻，我们还经常和他挑逗打闹，然而，现在他已是大学的副校长了。

汪振儒：25 届校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贝璋衡：25 届校友。